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尼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尼采 著

姚可昆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德)尼采著;姚可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ISBN 7-100-02046-8

I. 历… II. ①尼…②姚… III. 尼采, F.W. (1844~
1900)—哲学思想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462 号

LÌSHǐ DUÌYÚ RÉNSHÈNG DE LÌBÌ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德] 尼采 著

姚 可 昆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46-8/B·287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8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3

定价: 5.10 元

译者前言

1947年我曾将尼采《不合时宜的观察》中第二部分《历史对人生的利弊》译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译稿由商务付排，清样已排就，校好，后因该馆改组，未能付印出书。在译书付印时，我写过一篇译者序，在1947年6月1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报上发表，叙述尼采写这本书时的动机与目的，并对这本书内容作了简略的介绍。时隔30余年，现在又有人问及此书，说它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想到尼采思想极为复杂，他对于19世纪后期德国文化教育的批评非常尖锐，对于西方的哲学、文学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反动的一面。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这部尼采早期的著作中，例如他批评德国人研究历史不联系实际生活，主张“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而且只在学到的为生活服务中应用历史”，这种见解是相当精辟的；至于他蔑视群众，认为历史不是人民、而是少数“杰出”人物所创造的观点，则是很反动的。读者如能批判地读这本书，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以及了解欧洲文化界的某些思潮还是不无裨益的。

有鉴于此，我又重新修改了旧译稿，并交徐梵澄同志校阅了一遍，我对他提出的一些宝贵意见表示感谢。但是译者限于学力，译文中仍然有不少辞难达意之处，希望读者给以指正。

旧译付印前所写的序言对于了解这部著作还能有一些帮助，所以现在仅仅改动了几个字，附印在正文前面。

译者

1984年10月

译者旧序

尼采的著作生活可以显著地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71到1876年，也就是他在巴塞尔(Basel)大学充作教授的前半期。在这时期内重要的著作是《悲剧的产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1872)和自1873到1876年四年内相继出版的四部《不合时宜的观察》(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这里译出的是这四部《观察》中的第二部，于1874年2月出版。

尼采在这时，有许多写作的计划，从无数不同的观点涌出丰富的思想，往往是一个计划尚未实现，随后又有一个计划产生，致使他有些著作不能完成，只是片断地留在他的遗稿里。就以《不合时宜的观察》而论，在他的计划里本来有十三种之多，有时甚至多到二十四种，但是完成的却只有四部：除这部之外，第一部是《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1873)，第三部是《教育家叔本华》(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 1874)，第四部是《瓦格那在拜雷特》(Richard Wagner Bayreuth, 1876)；此外还有一篇《我们语言学者》(Wir Philologen)，写于1875年，本来也预备放在《不合时宜的观察》里，但当时没有出版。

他那时虽然有这么多的计划，可是他一切的思想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是文化的本质与德国文化的将来。他在1872年秋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任务：理解每个真文化的内在的关系与必要。”那时正是普法战后德国忽然兴起的时代，许多德国人以为不只是军事战胜了法国，就是在文化上也占了上风。尼采认为这个观

念是错误的，他觉得德国的文化在俾斯麦的政府下隐伏着许多危机，他看见德国的教育有许多病态的、畸形的现象，他于是对于这些现象痛下砭针，毫不容情地予以攻击。他的《不合时宜的观察》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出发的。他后来在他的《自传》(Ecce Homo)里提到这四部《观察》里边有这样的话：“这四个不合时宜的观察完全是战斗性的。……第一个攻击是针对我在当时已经以不加怜惜的轻视所俯视的德国的教育：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的：一种纯然的‘舆论’。没有比这更恶心的误解，人们相信德国人的战胜证明一些事物有利于这个教育——或者证明教育战胜法国……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观察是把治学方法中的危险的蠹蚀人生与毒化人生的部分揭露出来：——在这摒除人性的轮机与机械上边，在这工作者的‘无个性’上边，在这‘分工’的虚伪的经济上边，人生是病了。目的，文化，沦亡了：——方法，现代的治学，在野蛮化……在这篇论文中，这世纪引为自傲的‘历史的意义’第一次被认为病态，被认为颓废的典型的标记……”

尼采看来，这个攻击是必要的，无论是为了他个人的创造，或是为了德国文化的将来。他在1874年4月1日写信给戈尔多尔夫(Von Gersdorff)：“我只寻找一些自由，一些生命的真实的空气，我防御，反抗那些附着在我身上的许多的、无数的不自由的事物。只要人们尚未脱开这个不自由，脱开这偏执固陋的痛苦与压迫之感，就绝对不能谈到真实的创造。”但他紧接着也说出他近乎绝望的心情：“我会达到这目的吗？怀疑又怀疑。目的太远，纵使人们勉强地达到了，人们多半是在长期的寻找与战斗中耗尽他的精力：人们达到自由，同时也就疲惫得像是晚间的蜉蝣。我很怕这一点。这是一个不幸，这样意识到他的战斗”！在同一月的18日，他向富克斯(Carl Fuchs)说：“谁若要是并且永久是，或者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没有选择，只有：向前严格地战斗。”

至于他怎样战斗，在他谈到第一个“不合时宜的观察”时，他说他的战术有四种：“第一：我只攻击那些已经胜利的事物，——斟酌情形我得等候，直到它们胜利时。第二：我只在我得不到战友，我孤立，——我一直置身危境的地方攻击那些事物。……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步不发生危险的步骤：这是我对于正确的行动的标准。第三：我从不攻击个人，——我利用个人只当作一个放大镜，人们用这放大镜想出一个普遍的、但是潜伏的，难于捉摸的危机。所以我攻击大卫·施特劳斯，事实上是攻击一本老弱的书在德国教育上发生的影响，同时我当场抓住了这个教育。”

第二个观察可以说是前者的引申，他的战术也是同样。他所攻击的是德国 19 世纪史学对于德国教育所发生的影响，他所用的放大镜是哈特曼(E. V. Hartmann)。普鲁士于 1866 年战胜奥国，于 1870 年战胜法国，奠定了德国的统一，使德国的民族与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些一向偏狭的官吏与固陋的军人，在短期内仿佛一反掌似地变为具有伟大眼光的政治家与忠实而勇敢的陆军，于是一般的德国人都感到意外的自足，而德国的学者们也引以自傲，以为这是德国学术的成功。这是当时德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但是在这种气氛中还另有一小部分人，这骤然的胜利与成功并没有煽起他们的自足与自傲，却反而促使他们反省，使他们仔细想一想他们真实的功绩与价值，他们的陆军固然是战胜了，可是他们的文化与教育是否也同样战胜了他们的敌人。在这样考量时，他们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答的。——尼采就是这小部分人中的一个。

德国的学术自 18 世纪以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学者被视为民族的代表。学术在国家中得到过去不曾享受过的尊重。在 19 世纪德国的史学也登峰造极，那些从朗克(Ranke)的或是从外次(Waitz)的研究室里训练出来的学生们都对于他们

的客观态度,对于他们学术上的公正,对于他们的史学方法有绝对的自信。但是尼采看着当前的史学界的情形却发生了一个问题:“这样的历史对于人生是有利的呢,还是有害的?”

尼采以为,人们对于过去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历史的(Historisch),就是人们永久把过去当作一件实在的事物放在面前;一种是无历史的(Unhistorisch),就是忘却过去;一种是超历史的(Überhistorisch),这是处在超然的地位静观地观察过去。但是一个行动者则必须时而是历史的,时而是无历史的;他是历史的,因为他感到他与过去的关系,他看他是一个发展的继续,他是无历史的,因为他要创造新的,他不顾这个关系,但是他也承认,那种超历史的态度比前二者还要高一些,这种态度是在许多不同的现象形式中艺术地或哲学地去理解历史。

关于历史对于人所能发生的作用,据尼采看,也有三种,这三种作用可能对人生有利,可是也能有害;可惜在当时的德国是害多于利。一种是纪念的(Monumentalisch)作用,过去的伟大人物或事件浮荡在我们面前,鼓舞我们努力,使我们知道,这些伟大不是不可能的;同时它却也能以减少我们的勇气,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这无异于“用死者打死生者”。另一种是用好古的(Antiquarisch)方式去看历史,人们怀着一种虔敬的心去探讨与过去的关联,这也是有益于人生的,只要它不流为对于过去的不加选择的称颂,不流为盲目的保守。第三种是批判的(Kritisch)态度,这是摆脱开历史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束缚,使人生又得到自由的余地。但这种态度容易与无历史的态度相混淆。无历史的态度是完全忘却过去,人们在其中行为动作,好像是没有过去一般;批判的态度则是处处针对历史给过去一个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裁判。

然而这三种从事历史的态度在当时的德国,据尼采看,都不会发生有利的作用,反而盛极一时的历史教育却在阻碍着一个生动

的、活泼的文化的发展。至于它怎样阻碍文化的发展呢？尼采提出五点来针对史学界一般的现象。

第一，他觉得现代的人只着重知识而不着重人格，人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而形成内外不一致的矛盾。由于知识的表面化历史把知者与行动者及感觉者分开，把人的外表与内心分裂，因此而削弱那内外一致的、健全的人格。——第二，当时的史学在促成时代的妄想，人们总以为现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据有更多的道德与正直，那些史学家们把他们所标榜的客观态度当作正直，其实，据尼采说，这种正直只是坚强的裁判者，绝不是毫无感情的宦官一般的学者们所能有的。——第三，由于历史知识的过分，民族的本能被破坏了，它阻碍着个人的以及全民族的成熟。青年人在他们还没有认识人生之前，就负担起这么多光怪陆离的历史知识，使他们的本能无从发展。——第四，“由于这个过分就培养成在每个时代都有害于人类的年龄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自己甘心为后生与末流。”当时的历史教育所努力的与基督教所努力的不谋而合；将来是没有意义的，使人们永久看自己是遗产继承人，而不是遗产遗留者，并且觉得，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是好的，但是再作一些更好的事，就未免太晚了。——最后这种把我们这一代看作世界史的发展的目标与完成的观念却使一个时代“陷入一个对于自己暗嘲（Ironie）的危险的情调，并且从此陷入于犬儒主义（Zynismus）的更为危险的情调；但是在这情调里时代越来越向着一个聪明的自我主义的行动成熟，生命力由此而衰疲，最后被破坏。”尼采写到这里，对于这个观念痛加攻击，并且他找到一个这个观念的代表者——哈特曼。因为哈特曼在他 1869 年出版的《无意识的哲学》里承袭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说世界发展有一定的过程，人类必须经过童年、青年、壮年、老年等等阶段。

全书共分十章，尼采在前九章里一层一层地描画出当时的历

史在文化的前途上所投下的阴影，在最后一章，他面前却闪出光明，那是青年。他说：“我信赖青年，它（青年）真正地领导了我，如果它现在迫使我向现代人的历史的青年教育抗议，并且如果抗议者要求，人最重要的是学习生活，而且只在学到的生活服务中应用历史。”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他们所缺乏的真实的文化，这文化是“只能从生活里生长而开花”的。但是当时的青年教育却只着重在一种外表的、与生活分开的知识，它的目的不是在养成一些自由的人，却是制造一些学者，一些学术人，并且与生活分开。）

据尼采看，这种教育应该结束了，每个青年都必须成为无历史的与超历史的。无历史的即学习忘记，超历史即是把“眼光离开演变，转向那把永恒与不变意义的性格赋与生存的事物，转向艺术与宗教。”这样才能产生真实的精神与生活一致的文化。

全书是用一种极有力、极热情的文字写出的，刚出版时尼采曾预想必有热烈的反响，但结果适得其反，各方面对于这本书都是沉默的，从2月出版直到夏季，还没有卖出二百部。只有当时的著名作家希雷布兰特（Hillebrand）对于这本书写了一篇精辟的评论。在这篇评论里作者对于尼采表示无限的同情，但同时也指出尼采的一个错误：即是尼采好像把整个的德国当作一个大学，以为全德国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事实上，这位评论者说，当时德国还有许多人未曾受这种有害的教育，他们在生活里是勇敢的，不被历史所限制的。

这部《观察》是一篇生力充沛的文字，在尼采早期的作品里与《悲剧的产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它出版后虽然不曾得到什么反响，但是它的意义与日俱增，后来在德国的思想界里发生了很大的启示作用。就是在现在的中国这本书可资借鉴的地方也不少。只可惜译者的能力有限，不能把尼采的丰富的、热情的词句表达出来，原文越是精美有力的地方，译者对于译文越感到不满。此文译

成后蒙贺麟先生把它收入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丛书中出版，
并蒙杨业治先生校阅一遍，译者在这里谨致谢意。

1947年5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1
译者旧序.....	2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1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

前 言

“此外，凡是只教训我，而不丰富或直接激励我的行动的事物，这一切我都憎恨。”^①这是歌德的话，我们可以用这句话作为一个衷心表达出来的特见(Ceterum censeo)起始作历史的价值与无价值的观察。就是在这观察里应该陈述为什么没有激励的教训，为什么使行动疲萎的知识，为什么成为贵重的多余知识与奢侈的历史，我们必须严肃地按照歌德的话，要加以憎恨呢——其原因是由于我们还缺乏最必要的事物，而且多余是必要的敌人。的确，我们用得到历史，但是我们用它，与知识的花园中的娇惯的闲游者所用的不同，尽管那闲游者傲慢地俯视着我们的粗俗而无风趣的需要和切要。这就是说，我们用它是为了生活和行为，不是为了舒适地离开生活与行为，或者甚至于用以美化自私的生活和懦弱而恶劣的行为。只是在历史服务人生的范围内，我们愿意服务于它，但是有一种研究历史的情况，有一种使生活凋萎而变质的对于历史的评价：这一个现象，在我们这时代值得注意的征候上去亲身经验它，可能是很痛苦的，现在却也同样是必要的。

我努力过，去描述一个总是时常使我苦痛的感觉；当我把它公诸世间时，我也就对它泄了愤。也许有任何一个人由于听到一个这

^① 见歌德 1798 年 12 月 19 日给席勒的信。《歌德书信集》第二册，第 362 页。汉堡 Christian Wagner 出版社，1968 年版。——译者

样的描述，而向我说明，他诚然也认识这个感觉，但是他说，我没有十分透彻而根本地感到它，并且完全没有以适当的准确和成熟的经验表达出来。这样说的也许有一两个人；但是大多数的人将要向我说，这是一个完全颠倒的、不自然的、可憎的、绝对不容允许的感觉，甚至说我以这个感觉显示出我与这样有声势的历史的时代趋势是相违背的，这趋势显然是自从两代人以来在德国人中间特别显著。现在无论如何由于我敢于逼真描述我的感觉，由于我给许多人机会，去吹捧一个这样的，如上所述的时代趋势，一般的正当意识与其说是被损毁，勿宁说是被促进了。但是对于我，我却获得一些对于我比正当意识更有价值的事物——公开地对我们的时代得到教训，得到指正。

这个观察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把一些这时代有理由引为骄傲的事物，它的历史教育，在这里要试图解释为时代的伤害和残缺，因为我甚至相信，我们都患着一个消耗的历史的寒热病，至少我们应该认识，我们在患这个病。但是如歌德说过的，“我们悟到在培养自己的德行的同时，自己的弱点也随之滋长。”^①这句话有正当的道理，并且如果像人人皆知的，一个营养过度的道德——正如我觉得我们时代的历史的意识就是这种道德——能够同样像一个营养过度的罪恶，使一个民族腐败，那么就权且让我这么作罢。为了减轻我的罪名也不得不说明，这些激起我苦痛的感觉的经验多半取自我自己，只有为了比较才取自他人，并且在我是古代的，尤其是希腊时代的学徒的范围内，我只是充作现代之儿的我而得到如此不合时宜的经验。但是因为我是职业的古典语言学者，我必须要求被允许说上面这些话：因为我不大知道，古典的语言学在我

① 见《歌德自传——诗与真》下册，第6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者

们的时代会有一个什么意义，若不是有这个意义，它在这时代里不合时宜地发生影响——这就是说反对这时代，由此而影响这时代，并且希望有利于一个将来的时代。

你看看在你旁边游牧的畜群罢：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昨天，什么是今天，到处乱跳，吃草，休息，消化了又跳，就这样从早晨到夜里，一天又一天，和它们的快乐与不快密切相连，这就是系在瞬间的柱子上，所以它们是既不忧郁，也不厌倦。观看这情形使人感到难过，因为在动物面前他自傲他是人类，可是怀着嫉妒去看动物的幸福——他只愿望像动物似地既不厌倦也不在痛苦中生活，可是他徒然地愿望着，因为他不愿意和动物一样生活。人们假如问动物：你为什么 not 向我述说你的幸福，而只是看着我呢？动物也愿意回答，并且要说：这是这个原故，我总立刻就忘记我所要说的话——但是在这时它也已经忘却这个回答，它沉默着：致使人对此感到惊奇。

但是他对于他自己也惊奇，他不能学习忘记，并且永远与过去的事物联系着。无论他跑得多么远，多么快，这锁链也跟着一齐跑。这是一个奇迹：瞬间是倏然而至，倏然过去，前此是一个虚无，过后是一个虚无，可是它还充作鬼魂回来，而且破坏一个后来的瞬间的安宁。从时间的书卷中不间断地脱开一页，它掉落出来，翩翩飘去——忽然又飘回来，落在人的怀里。于是人说：“我回忆”，同时羡慕动物，它立刻就忘记，它看着每瞬间都真正地死去，沉入雾和夜里，并且永久消灭。动物就这样无历史地生活着，因为它在眼前消除像是一个除得尽的数目，不剩下一个奇特的余数，它不会装假，无所隐藏，在每一瞬间它都完全显现出它是什么，所以它绝对不能与本来面目不同。人却支撑着过去事物的庞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担负：这担负把他压倒，或是把他压歪，它是一个看不见的、阴暗的重担，

使他的步履艰难，他在外表上好像有时能够否认这个重担，他在和他同类人交往时甚至太喜欢否认它；为的是唤起他们的羡慕。若是他看到游牧着的畜群，或是较亲昵地看着小孩，这小孩还没有过去的事物必须否认，在过去和将来的篱笆中间，在过分幸福的盲目中游戏着，于是他就感动了，好像记起一个失掉了的乐园一般。可是小孩的游戏也必须被扰乱；就是在过早的时候它就从忘记里被呼唤出来。他就学着去了解“从先是”这句话，这是一个通行口号，斗争、苦难和厌倦都随着它走到人这里来，它使人想到他的生存根本是什么——是一个永久不能完成的过去式。若是最后死亡带来了人所热望的忘记，可是它同时也就把现在和生存都给夺去，并且以此封印了那个认识——生存只是一个永不间断的“曾是”，只是一个事物，它生活在否定自己，消蚀自己，自相矛盾里。

若是一个幸福，若是一个向着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一个意义中正是那把生活者牢牢地固定于生活里又把他向着生活推进的事物，那么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比犬儒学者^①更有道理了，因为动物的幸福也就是完成了的犬儒学者的幸福，对于犬儒主义的道理是活的证明。那最小的幸福，只要它不间断地存在，并且使人幸福，它就无比地比最大的幸福还幸福，倘若这最大的幸福只成为一段插话，似乎是一时的兴会，疯狂的奇想，出现于尽是不快、欲望和缺乏的中间。但在最小的幸福时与在最大的幸福时总归是这一点，由于这一点幸福成为幸福，就是“能忘记”，或者说得文雅一些，就是有能量，能在一段时间内无历史地去感觉。谁不能坐在瞬间的门槛上，忘记一切过去，谁就不能像是一个胜利女神，不晕眩，不恐惧，站在一个据点上，这人将永不知道什么是幸福，说得更坏一点：他

^① 犬儒学者(Zyniker)，公元前四百年雅典一个学派的信徒，他们认为人生无所要求，毁弃礼法，其中代表人为Diogenes。——译者

将永久不能作一些使旁人幸福的事。请你们想像这个最极端的例子，想像一个人，他完全没有忘记的能力，他好像被判决，到处看见一个“变”。一个这样的人再也不相信他自己的“存在”，再也不相信他自己，他看一切都是分散为许多动点，他也自失于这个变的河流中：他将如赫拉克利特^①的真正的弟子，最后似乎再也不敢举一举他的手指。一切的行为中也有忘记：正如一切有机物的生命不是仅需要光明，却也需要黑暗。一个人若是从始到终只要历史地感觉，他就要和一个被迫不能睡眠的人相似，或者像那只是仗着反刍和永远一再的反刍来继续生活的动物一般。所以，这是可能的，几乎没有回忆去生活，而且是幸福地生活，就像动物所表现的那样；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对没有忘记还能生活。或者，更简单地说明我的题目：失眠、反刍、历史的意识，都有一个度数，一到这个度数，凡生者就要走向损害之途，最后归诸沦亡，不管这生者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文化。

为了规定这个度数，然后由于这度数，规定一个边界，在这边界上过去的事物必须被忘记，如果过去的事物不应该成为现在的事物的掩埋者，那么我们就必须确切地知道，一个人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的造型的力量有多大，我所说的是那个力量：从自身独特地生长、改造过去的和陌生的事物，并化为已有，治愈创伤，补充遗失，再造出已经破碎的形式。有些人很少据有这个力量，致使他们为了一个唯一的经历，为了一个唯一的痛苦，常常甚而为了了一件唯一的微弱的枉结，像是为了一个非常细小的流血的伤口，就会不可医治地血流不止；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人，纵使最粗野的和最恐怖的生活事故，甚至是自己的罪恶行为，很少使他们感到伤

^①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公元前五百年的希腊思想家，认为万物之原，谓万物之现象皆相对而流动，认为流动为宇宙之原则。——译者